

中国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

中国音乐学院 杨红

21世纪,伴随着世界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多样化,民族音乐学日益趋向整体化研究。而中国传统音乐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又是怎样以它特有的自然活态现状存活于民间文化土壤中,与现代化遭遇相适应?在田野中又怎样把握音乐与其相关联的文化因素的整体关系?笔者近几年通过对“西口路”和“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的实地考察,从实践中提出了对中国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的方略,从中获得深刻的音乐文化体验和田野中的音乐民族志构建。

一.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符合当今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

受全球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虽然也面临着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同化的危机,但在各地政府相继推出的有关措施中,也得到不同程度地保护与开发。特别是在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地区,传统音乐依然以其鲜活的存在方式活跃在社会现实中,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

传统音乐的活态资源即指当今鲜活的音乐文化生态,它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根植于民间历史文化土壤中,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如何在现代田野工作中去搜集、挖掘并加以完整地记录和描述,均要树立整体研究意识,将传统音乐以及存活相连的文化事象一并整合考察,这才能使传统音乐鲜活的生存样式得到完整地保护,并从本质上加以认知和解释。

1.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是应当今大规模的复杂社会所需,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创新课题。

现今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民族志式的活态观察,以获得不同地区相适应的客观真实样本,而不同样本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将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研究,也就是整合性研究。

目前,中国国家级以及重点攻关课题均围绕着整体性的地域音乐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而展开。如2007年樊祖荫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等。可见,整体研究能为地区性的音乐生态与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措施提供建设性的、真实的文化资源和方略。笔者2003年的北京市人文社科研究课题《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和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西北高原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其选题均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从我国经济建设布局看,西北高原是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重点地域,在人力、物力上将有重大投入。从人文民族关系看,和谐社会的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又紧迫。从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看,自古以来该地区多民族音乐文化遗存丰富,须深入挖掘的资源十分雄厚,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有必要从总体整合的视角,对多民族音乐文化建设在新世纪的规划蓝图及时作出超前的构想,其基础理论工作便是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梳理、研究,达到总体的概观。该课题的创新之处,首先表现在由于以往的交通不便,很多实地考察是前人无法做到的,而从文化建设上提出高原联袂的研究方略更是首次提出;其次,这是国内外首次对秦直道音乐文化进行整体的考察与研究,从而提供一个完整的该地域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方略。

2.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是21世纪民族音乐学之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近几年来,全球化趋势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热门话题的宣传,引起了民族音乐学家的关注。2006年在国内有一集中探讨,如美国学者李海伦(Helen Rees)关于美国当代民间遗产的保护方案及发展的探索(2006),中国学者从传承角度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冯光钰2006,毛继增2006)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考及理论探讨(伍国栋2006,樊祖荫2006,项阳2006,田青2006,洛地2006,杨民康2006)等,上述都表现出对当今传统音乐的保护认知和学术态度。

美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发展,在世界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和代表著述,导致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阶段性转型和发展。如梅里亚姆的三元结构模式(Merriam 1964)、内特儿的音乐与文化研究(Nettl 1983, 2005)、西格的音乐民族志构建(Seeger 1987)、雷斯的四级目标模式以及音乐体验和民族志的三维理论空间(Rice 1987, 2003)等理论研究,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而又深远影响的理论框架,在中国也得到很大反响。近年来,美国一些民族音乐学家陆续被中国的音乐院校邀请讲学,如内特儿、西格、雷斯、郑苏、李海伦、杰杰(J. C. DjeDje)等,他们不仅带来了世界上民族音乐学前沿学术信息,而且也建立了学院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教学均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对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支持,通过文献和交流,又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界带来了新一轮的学术前景。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影响日益增长。跨学科的整体研究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主要方向之一。如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音乐民族志(Musical Ethnography)、认知民族音乐学(Cognitive Ethnomusicology)、音乐语境(Musical Context)、国家、政治与社会变迁(Ethnicity,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等多重视野,中国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个案研究范例,从中均凸显出新理论与方法和新领域的探索,并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跨学科的多元审视。如曹本冶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西北卷,2003)和《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华南卷,2007)、张振涛的《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2002)、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2003)和《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2008)、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2003)、张伯瑜编译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2007)等等。可以说,传统音乐的整合研究就是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学理上,根据研究对象特质,综合上述多维视角,系统、全面、整体地关照一个音乐文化事象和群体的音乐文化事象丛,进行跨学科性质综合考察研究。另外,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也是立体化思维的结晶,以多维研究视角,从某一“乐种”的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点),到综合性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面),采用普查、定点考察、访谈、录音录像、参与民俗事象等多手段,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企望在历时与共时的多维纵横交织的坐标中,找到合理的文化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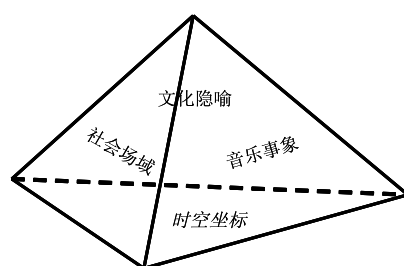
二.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模式的理论构想

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论始终是学术探讨的前沿课题之一,然而,如何在实地考察中构建理论体系,则是一全新的学术需求。

如何从整体角度,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的田野考察,在实际的活态现状基础上进行传统音乐研究,从而提出整体性的理论建树和实际应用前景,为真正的传统音乐保护提供科学化依据?笔者对秦直道上的传统音乐的考察研究就是以真实性、鲜活性作为首

要的目标,继而把该地区众多鲜活的音乐品种整合在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中,作为一个整体来挖掘、提炼、开发并保护,共同提供一个真实性、客观性、鲜活完整的整体面貌。其理论价值就在于对古代音乐文化在当代的遗存有一个完整地了解,继而为西北高原当代音乐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提供实证性的丰富而鲜活的资源。通过这个调查,提出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略和规划。

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对小规模社会调查开始,就已经注意到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有文化的特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特别是整合的需要。其中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而“路文化”恰是中国历史文明的一个缩影,从丝绸之路、西口路等多种传播路线,撒播下的是文化的种子。2003年,美国学者雷斯提出了时间、地点、隐喻是研究音乐体验和音乐民族志的三维理论框架,为笔者对活态音乐的整合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该理论的实际运用曾在笔者的《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2006)中得到具体运用和阐发。而整合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多维思考。



整合研究模式：
四面体金字塔模型

时空坐标：雷斯曾在《音乐体验和民族志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2003)一文中提出了“音乐体验中的三维空间”(three-dimensional space of musical experience)概念,以此建立“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音乐民族志”。因此,雷斯为音乐体验和民族志提出了三维空间:即时间、地点、音乐隐喻的理论研究方法 (pp.151—152)。雷斯将时间维(time)界定为:“至少有两种方法来理解时间,一种是按年代顺序的或历史的,一种是按体验的(experiential)或现象的(phenomenological)。” (p.162)

而当我们把研究对象锁定在某一文化区域时,时空坐标是首要因素。中国作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若要认识音乐的文化风貌,必需着眼于历史背景,从它所处的本土概念认知模式,以及展现音乐行为的整体环境和文化意义着手。这种从历时、共时、地域、社会、概念、行为、个体、音声之间形成互动关联的思维,是构成时空坐标的因素的理论基础。

时空坐标即指从历时(即按照年代顺序的)和共时(当今的时间和体验)双视角来进行跨时空的思维考虑,空间则更多的是确定地域范围。两者时常需要互动和转换思考。

社会场域:如何审定研究对象,需要由社会影响下的不同的点组成,雷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具有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地点维度的一种方法概念,这些嵌套的点有:个体的(individual)、亚文化的(subcultural)、区域的(local)、地域的(regional)、国家的(national)、地区的(areal)、散居的(diasporic)、全球的(global)、和虚拟的(virtual)。虽然这些空间可以是指世界的地理位置,对音乐体验同样重要的也有些是指一些音乐家和观众想象他们体验音乐的思想中的地点。(p161)而在整合研究框架中,笔者将分成两部分去理解,一是要确定这些具有社会意义上的“点”,即典型个体、亚文化、区域、地域、国家、地区、全球等,这主要从社会文化影响上来考虑,二是在研究对象具体的活动场域,确定研究脉络。这

里又是具有一定地理位置的场域。在笔者的调查框架中，以传承人、传承链（组织）、传承的音乐形态和表演、传承曲目、活动区域以及生态环境及其活态现状为基本内容。

音乐事象：当今的活态音乐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鲜活地存活于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事象和民俗中，从而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若考察音乐，绝不能脱离其相依附的民俗事象，而是应加以整体研究，以便确定音乐在其中的形态、功能和作用。所以，音乐事象是一个集合名词，是音乐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密切结合的混合载体。

文化隐喻：这是音乐事象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雷斯在隐喻维（metaphor）中，认为隐喻来自于一些信念，那就是，音乐的本质是通过形如“A是B”的隐喻来表达的。这些信念从而形成了对音乐和音乐行为进行论述的基础。现在一般应用的隐喻有：音乐是艺术、认知、娱乐、治疗、社会行为、商品、象征符号和解释文本。（p163-165）笔者认为，雷斯试图把隐喻加到时间和地点上，构成一个三维空间，来表达音乐体验的不同含意。虽然隐喻这个词在这里的运用尚需探讨，但是，无需质疑的是，音乐体验和文化是通过人类的思维和认知而相互映像，音乐体验是文化的一种折射，音乐体验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展示。

上述四个维度，是互动的关系，时空坐标奠定了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刻内涵，给文化隐喻提供历史与现今时空的支撑，社会场域是在时空坐标下对研究对象的社会脉络及层面的构建，音乐事象是社会场域下的具体文化载体，是考察音乐民族志所在，而文化隐喻则是音乐事象的具体文化本质内涵和意义的阐释，四者互动从而构成整合研究之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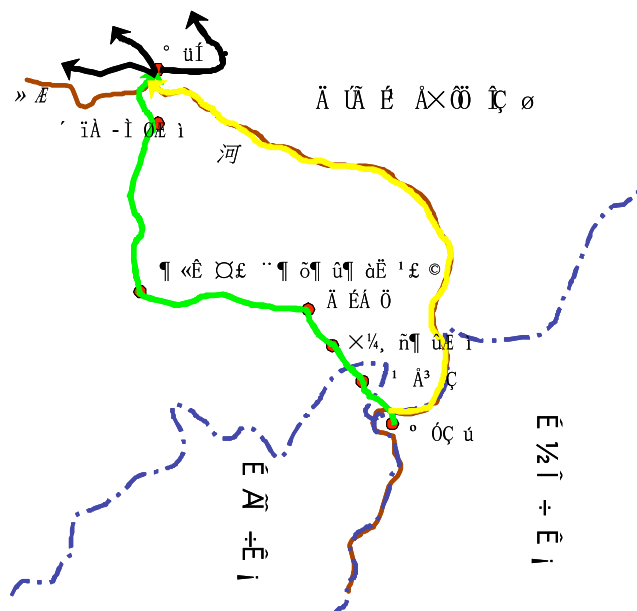
三. 从“西口路”到“秦直道”：传统音乐整合研究的全新文化体验

在中国晋西北、陕西、内蒙西部接壤的这片广漠无垠的黄土地上，跨越不同省地和民族，黄河长城从中交错，这里，既包含着黄土高原与内蒙古草原的过渡带，又蕴含着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融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该地区中国传统音乐蕴藏十分丰富，其中，产生在近代的西口路文化，蒙汉文化交融培育出了二人台、蛮汉调（Mon-Han Tune）（Mongolia-han Tune）等多样传统音乐品种，构成了蒙汉音乐各异并相互交融的西口路文化区域。如追溯其更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历史上还有著名的秦直道在该地域延伸，这里曾经繁衍生息过匈奴、突厥、契丹、党项和后来的蒙、汉、回、藏等多个民族。这两条路在鄂尔多斯到包头地段是重合在一起的。这种路文化的传播，如同音乐史上张骞通西域所带来的民族交流盛况，均体现出“路文化”的整体传播特色，而从现今的活态音乐中均能显现出中原文化、北方匈奴文化的遗留以及成吉思汗留驻文化的并置及相融一体的历史文化特质。

走西口是中华大地历史上形成的重大迁徙之一，它上下300年，纵横9000里。西口路文化首先是商业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大融汇文化。笔者于2002年至2005年，对西口路上的二人台音乐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以历时三年持久扎实的田野考察以及丰厚的田野考察文本为基础，跟随当今民间戏班深入山沟僻壤间8次“走西口”进行田野实地考察，从多维视野对二人台进行系统性整体研究，搜集挖掘并考证记录了大量真实客观的田野文本，同时，以音乐体验和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三维认知空间，针对中国本土音乐个案，从全新视角提出并构建了田野中的宏观-微观-互动三重研究层面以及对诸种田野文本的多向解释的理论与方法，从时间、地点、社会维护、文化象征等角度，展开了宏观与微观、过去与现在、原型与变异、局内与局外等层面的综合探究，希望能从“二人台”这一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文化事象上升到概括化的文化定性，转而寻访各种“文化流”的生命力。

将“二人台”置于历史与地理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中，对二人台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历史的追溯，是该项研究的起点。从历史构成、社会维护的角度，探究汉唐以来的晋北地缘文化背景以及蒙汉文化交融的文化历史渊源，从中看出二人台的流行地域既呈现出地缘文化的地理特征，又是晋北、陕北、鄂尔多斯部三大边缘文化板块并置与碰撞之处，最终形成与二

人台产生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走西口”这一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考察中，笔者对一些地理方面的重要文化古迹遗留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如西口古渡、黄河龙口、文化古迹浮雕、古戏台上历史上河曲戏班的题记等，获得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考证文本。加之各地的志书、政协文史资料等，成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引证材料。其次，展示对二人台在当今生态环境的实地普查结果。笔者于2002年至2004年间，曾经沿着这个地点维上的多处地点，跟随河曲民间戏班到各地的演出点进行体验，其最终目的就是追寻着这个几百年来的传播路线，体验着二人台得以生存发展的这片土地的过去和现在。



° ÓÇ ú×BÎ ÷¿ ÚÊ %Ò aÍ %£ ..Â ÎÎ B±iÊ %×B² Ýµ ØÂ •İ B£ →Æİ

西口路文化中的二人台演出活动始终伴随着区域文化的展现，它们集中表现在晋陕蒙交界地区乡间村落的诸类乡俗礼仪生活中，从而构成丰富多彩的音乐事象活动。二人台这种跨地域文化现象的形成，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产生互流关系的结果，是走西口这种“路文化”走出来的结果，地缘文化迁徙传播出来的结果，乡俗礼仪哺育出来的结果，蒙汉音乐（异质文化）融合出来的结果。二人台的社会场域由戏班、戏班群、乡村、晋陕蒙交界地区、国家、全球等几个嵌套组合在一起的地点、地区、社会 and 音乐活动点组成，是用来思考和描述人们创造、体验以及理解音乐的众多的社会位置。该场域是随着不同族群、不同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嵌套的、动态的、多重的和被构造的社会结构。

二人台作为西口路文化的代表品种，必定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互化相融，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其多态的音乐事象充分展现出二人台与乡俗礼仪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二人台在以乡村为背景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存在意义。笔者曾经亲身参与考察了二人台参与其中，并从中发挥主要作用和支撑地位的9个音乐文化事象，即通过二人台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闹“红火”、个人生活礼仪、物资交流会、传统节日（正月闹元宵）、庙会、神会等不同文化事件的个案研究之比较，探讨河曲民间戏班与西口路不同地域的各类非定时和定时性乡俗礼仪生活的互动关系，从而展开属于地方戏曲所特有的、长期以来又容易被人们低估或误读的那份存在于民间草根阶层的价值意义的探讨。

- Ĩ ç' âÊ Õ³ £É ú» îŒ° Ðµ» ÅÅ Œ
- , öÊ ÊÊ ú» îÀ ñÒ Ç
 - ³ ÉÃ êÒ ÇÊ 2Ê êĹ "Ê ø
 - » é¼ ÐÀ ñÒ Ç
- ×¼, ñŒ ûÊ ìµ ĀĬ ĩ×Ê½ »Á ÷» á



Œ pÊ ÊĬ ï ò ôÀ ŒÊ ĀĬ ó

在对二人台的音乐体验中，对记录活跃于诸类文化事象中的二人台演出，从不同的时间维和不同的地点维，已基本涵盖了河曲民间戏班的活动轨迹，显露出具有作为艺术、娱乐、象征、身份认可、社会行为、以及商品等隐喻维内涵。因此，透过两个河曲民间戏班的演出，隐喻折射出的是“走西口”，或曰“西口路”的一种传统的“文化遗留”（cultural heritage），它展示着往日西口路文化的历史轨迹。可以说，是西口路文化造就哺育了二人台音乐艺术，反之，二人台又始终依附着西口路上的乡俗礼仪生活，并成为西口路地域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一方面来讲，二人台其中的隐喻已经超越了雷斯所言“隐喻”的内涵，并具有深刻的历史、地域文化以及跨地域文化身份等多方面所指。

笔者通过对二人台和地域文化的互动研究，来探求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所隐喻的更为广远的文化意义。晋陕蒙交界地区的村落乡俗礼仪，构成了这个跨地域社会—文化的秩序体系。二人台紧紧参与其中，通过传统节日、神诞的节日庆典、民间信仰的延续和乡村日常的人生仪礼，使得村落历史的延续得以显示，与此同时，乡俗礼仪生活也凸显了社会变迁的轨迹。在现代化背景下，这样的研究或许能照亮当代的某块历史之荫，使之融入于现代化社会中，形成一个平等的历史话语，显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作者认为河曲二人台作为一种“世俗的娱乐”，不仅与地域文化产生密切的互动，还是西口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¹ ÈÄ ¼¹ ÌÈ ý¹ ÙÄ í» á
- É ñÄ ¼¹ ó±¼µ ±Õ òÈ î¼ ò»
» á
- Ä ñ¼ ä¼ Àì ë¼ ÒÈÖ¼Æ½ Ú



¶ þÈ ÈÌ ¨Ó ëÌ çÈ ×À ñÒ Ç

笔者自2006年夏至今，在西口路音乐研究的基础上，又对秦直道沿线传统音乐活态现状展开田野调查，在西口路文化区域里即周边地区，与万里长城一样的工程浩大、撼人心魄的秦直道遗址是内蒙古、陕西境内保存下来的为数极少的古代交通遗址，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政权，防御外患，便于巡视北方，修筑了这条由陕西关中直达黄河河套阴山脚下的大型军事交通工程——秦直道。秦直道南起秦都咸阳，北达古阴山九原郡，全长736公里，中经17个县，纵贯渭北高原横山山脉，高原沙漠、黄河南北丘陵沙地。秦直道沿途，至今已发现：秦代行宫遗址16处，西汉房舍遗址60处，亭障遗址22个，烽燧遗址50个，发现了设于阳周县（今靖边县）蒙恬指挥直道工程的住所遗址，还发现在毛乌素沙漠区保存有较好的黑垆土古道。路面平均宽度约30米，最宽处约80米，由于道路大体南北向直，故称“直道”。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了“堑山湮谷，直通之”的描述。公元前33年，王昭君远嫁匈奴“胡汉和亲”，走的就是秦直道。秦直道在历史上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我国形成多民族的大家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初步完成上段及中段的考察任务。

从陕西的咸阳淳化，到内蒙古包头区域，古代的秦直道、近代的西口路、当代的西安—包头高速公路，都在这个地区伸展，这里又是地形复杂的高原地区，融合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具有埋藏很深而又丰厚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



Ç ØÖ ±μ À¹ Åμ ØÍ ¼Ó ëĬ Ö½ ñμ Øμ ā¶

秦直道沿线实为高原联袂地域，北半段的河套文化和鄂尔多斯文化融合，传统音乐文化蕴藏深厚，鄂尔多斯古代民族，如匈奴、敕勒、党项等虽从名称上已消失，但是其古代民族音乐文化融合其中，遗存保留在当前当地的蒙古族音乐中，如蒙古族的长调、短调、器乐，成吉思汗陵的祭祀音乐、鄂尔多斯婚礼歌曲、宴歌中，还有蒙汉文化融合的品种二人台、蛮汉调、爬山调、山曲等，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品种共存互渗的文化生态。南段则有陕北高原特有的信天游、榆林小曲、陕北大唢呐、陕北说书、秦腔、碗碗腔、眉户戏、安塞腰鼓等多样民间音乐舞蹈品种。

2006年8月，笔者带领研究生及地方学者一行5人，沿秦直道沿线实地考察了秦直道的内蒙古段（秦直道北段），对包头市西南孟家湾村麻池古城、昭君坟渡口——金津、二狗子湾古城、鄂尔多斯东胜西南漫赖乡秦直道遗址“古路豁口”等地进行了实地踏查，对该地域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进行了宏观抽样普查，为课题研究进行了实地考察论证，而在2007年和2008年夏的后续考察中，确定了具体的典型个人以及相关组织，如二人台民间戏班、婚礼音乐及音乐家、准格尔蛮汉调、鄂尔多斯宴歌、文化独贵龙（民间组织）、榆林小曲等考察事项。

在前期西口路音乐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对音乐品种及其相属的音乐事象展开面上的考察，在秦直道北段，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融的音乐遗存及其近代蒙汉文化交融的活态现状复杂而多元化，考察的音乐事象包括包头城市公园的老年二人台演出、宝格特风情园的蒙族音乐文化展演、黄河边汉化的蒙古村落的蛮汉调和二人台演唱、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宴歌、准格尔的蛮汉调、鄂尔多斯婚礼音乐（蒙汉结合）、乌审旗嘎查村那达慕、乌审旗沙漠草原牧民家（独贵龙）的鄂尔多斯长调及短调歌曲、榆林小曲、统万城下庙会的陕北说书等。



包头公园二人台表演



宝格特蒙古民歌演唱



鄂尔多斯婚礼音乐



鄂尔多斯宴歌

秦直道音乐事象（一）



毛乌素沙漠民的鄂尔多斯长调演唱



榆林小曲



原查村的那达慕蒙古歌舞表演



统万城下的陕北说书

秦直道音乐事象（二）

对秦直道沿线传统音乐文化的整合研究，不同的音乐事象具有其特有的文化隐喻所指，但它们有着大一统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秦直道大大缩短了中原与边疆的距离，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原民族与北方各部族经历长期战争的结果，是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我国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秦直道的考察正在日益深入，新的成果告诉我们，它不仅是民族和亲之路，而且是民族团结、商贸发展文化交流之路。它沟通南北，促进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张光耀 2007：155-156）如在鄂尔多斯婚礼音乐及鄂尔多斯宴歌中，其演唱习俗、伴奏乐器依然保留其传统特色，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和特征，在当今的传承和演变过程中显露出昔日的文化特质。

北齐时流传下来的那首古老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只是当时对天然草原的赞美，在秦始皇时也应该如此，而到近代，这片与跟黄河融为一景的富饶牧场，更是走西口人追求向往的一片肥沃的土地。

从西口路到秦直道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研究，不仅是探索该地域整体的音乐文化遗存。把这些活态现状挖掘展示出来，其研究还可与开发应用结合起来，把至今仍然活跃在民间自然生态之间的民间音乐推向现代传媒、现代舞台，并把这些传统音乐的多样化品种，展示在一个大文化背景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研究成果将对西北高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通

过自古到今的“路文化”，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展示出这一地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该地区的生态与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措施提供建设性的、真实的文化资源，从而形成当地的艺术节，展示在舞台上，走向全球，对世界音乐文化做出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曹本冶主编：

——《中国传统音乐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西北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东卷、华南卷），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樊祖荫《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思考》，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冯光钰《传承发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音乐的最好保护》，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毛继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成功探索》，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李海伦《美国当代民间艺术遗产保护方案及发展趋势》，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

洛地《关于尊重和保护“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三条意见》，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田青《鲁迅错了吗？——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内容》，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伍国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考——以传统音乐文化类型为题》，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项阳《保护：在认知和深层次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前提下》，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杨红：

——《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河曲民间戏班与地域文化之互动关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田野中的音乐体验之研究□□试析有关中国民间综合演艺品种的音乐民族志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乡俗礼仪中的民间戏班研究□□对两个民间戏班的田野调查》，载《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3期。

——《蒙汉文化融合的综合载体□□二人台历史生态环境的考察与研究》，载《音乐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杨民康：

——《原形态”与“原生态”民间音乐辨析——兼谈为音乐文化遗产的变异过程跟踪立档》，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2003年1月出版。

——《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

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张光耀主编《秦直道——探索与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张振涛.《冀中乡村中的鼓吹乐社》，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英文文献：

Merriam, Alan P. 1964.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Nettl, Bruno. 2005.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hirty-one Issues and Concep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ice, Timothy.

———. 2003. “Time, Place, 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 *Ethnomusicology* 47(2): 151-79.

———. 1987. “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31(3): 469-88.

Seeger, Anthony. 1987. *Why Suyá Sing: A Musical Anthropology of an Amazonian People*.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